

香山和辛亥革命

黎志剛

澳洲昆士蘭大學

百年來中外學者對辛亥革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1】其中對不同群體，【2】國家【3】，革命領袖【4】和地區【5】在辛亥革命中的貢獻更有可觀的深度研究。然而，香山地區（包括今中山、珠海、澳門、澳門等地）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香山翠亨村是孫中山先生（1866—1925）的故鄉。香山地區在革命過程中起過重要角色卻在二零一零年前沒有系統的研究。【6】近年以來，雖有一些文章對香山地區和辛亥革命有所討論。【7】為了紀念辛亥革命90和100周年，廣東省中山市和孫中山故居紀念館【8】及一些海外中山同鄉會在香港和中山各地舉辦過多次《香山人與辛亥革命》的展覽，揭示香山人在辛亥革命過程中的貢獻。中山市電視臺也拍了電視文獻片《香山人與辛亥革命》。但至今還沒有全面探究香山地區和辛亥革命的總體關係。本文是企圖對這一與辛亥革命有重要關聯的地區作一簡要的論述。文中分別就革命思路的萌芽、香山革命黨員在籌款、革命宣傳及香山婦女和海員在運輸軍火中的貢獻作一討論。最後並以香山起義和共和談判中香山人的作用作總結。我希望從香山人的國際視野和冒險犯難的傳統來分析香山人性格和其革命取向之關係。

一、香山縣和革命思路的萌芽

廣東香山縣位於珠江口，面對海洋，毗鄰港澳，是著名僑鄉；也是孫中山先生之故鄉。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香山人有著創新、務實的傳統。在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過程中，香山商人一直在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香山地區具有便於中西文化交融的獨特地理環境，造就了近代香山以孫中山等為代表之「敢為天下先」的革命傳統。

澳門是香山人走入世界的視窗。從明代開始香山開始有對外貿易，早在十六世紀就成為葡萄牙人的佔領區，也是中外交通孔道。澳門開埠以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成為香山人出國留學或移民海外的通道。香山人因此得近代風氣之先，較早接受西方文明和近代化思想。香山商人具有國際視野，更具備敢為天下先的開拓精神，成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是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香山買辦和四大百貨公司在中國近代史上均具有廣泛的影響，唐廷樞、【9】徐潤、鄭觀應、馬應彪、郭樂等企業家對中國近代商業發展發揮過重要推動作用。香山商人由於經常跟洋人接觸，具備國際性的商業視野和專業知識，推動了產業轉化、股份制度的實行以及新式的經營方式。如著名的四大百貨公司，都是香山人到國外接受了新的商業思想，而回到國內創辦的，它們的視窗式售貨、明碼標價以及設立電梯、娛樂場所，通過廣播來推廣商品等商業方式，都和傳統商業文化不一樣。其他如創辦輪船招商局時採用的股份制，從事保險業等等，不勝枚舉。香山商業以創新、務實的香山文化為背景，對推動近代商業改革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如果我們瞭解這一歷史和商業淵源，對辛亥革命領袖和黨人多出自香山縣不無瞭解。我以前曾寫過一篇有關香山人冒險傳統的文章，就地理環境和民風分析香山人的敢作敢為性格。【10】

孫中山早年從香山走入澳門和香港及檀香山，飽受西學影響。1894年6月，他得到具有維新思想的容闈（1828—1912）和著名維新救亡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2）的支持上書李鴻章。鄭觀應是一進步買辦和招商局的負責人之一。鄭觀應幾度增補《易言》和《盛世危言》，指責洋務派只學西方科技，不重視政治體制改革，是「遺其體而求其用」，「遺其精義而襲其皮毛」，主張興辦議院、廣設學校、發展工商業、變革圖強、挽回利權、抵制侵略，他的變法思想對孫中山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鄭觀應為孫中山寫過一封介紹信。並為孫中山申請由上海經日本前往檀香山的護照。孫中山《上李鴻章書》的部分主張，鄭觀應在1892年已在其著作裏提出，孫中山在澳門很明顯受到鄭觀應的影響。這萬言書，陳述了孫中山經過多年醞釀的救國方略，可惜未能為李鴻章採納。值得注意的是，《上李鴻章書》實際上完成於澳門。上書失敗後，孫中山決心革命。開始籌建「興中會」。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的革命口號，於檀香山成立近代中國的一個新式的革命團體——興中會，開始用革命手法尋求中國的出路。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並闡發為「三民主義」。除政治領導外，作為同盟會的創建者，孫中山還通過同盟會體現對革命組織的領導。他通過革命組織聚集革命志士，宣傳革命主張，聯絡會黨，運動新軍，發動革命起義，為辛亥革命奠定基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他之後被推舉為共和國臨時大總統，是創建民國、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奠基人。

二、香山革命黨員在籌款、革命宣傳中的貢獻

反清革命以孫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為始。次年初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隨後一些革命團體，

諸如華興會、光復會等相繼建立。香山愛國華僑鼎力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他們有的慷慨捐餉，熱心宣傳，衝鋒殺敵。他們建立各種社團，創辦報紙，捐資捐物，用各種方式支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

「華僑為革命之母」，香山華僑革命黨員是孫中山的忠實支持者。當孫先生為準備發動1895年10月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募集經費，檀香山香山華僑鄧蔭南變賣家產、商店和農場支持革命。香山華僑宋居仁、李杞、侯艾泉、陳南回國參加這一次廣州革命。起義失敗後，被清政府通緝。這次起義犧牲的還有孫中山翠亨村同鄉摯友和興中會會員陸皓東（1867—1895），陸被捕後從容就義。孫中山稱陸皓東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香山南朗田邊人程奎光於1895年在廣州加入興中會，負責聯絡廣東水師並參加廣州起事。後也被捕犧牲。廣州起事失敗後，孫中山脫險到香山小欖鎮，藏於「昭忠祠」內，後經友人協助乘船抵香港，和陳少白、鄭士良一起離港赴日本，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鄉親楊心如（1869—1946）是中山先生好友楊鶴齡的堂弟，他早年加入興中會，也參加了1895年廣州起義和1900年惠州起事。楊心如更捐資支持革命，奔走香山、澳門、香港、臺灣之間聯絡革命志士並協助陳少白建立興中會分會。1911年到香港策應「三·二九」起義並參與善後工作。

檀香山的華僑是孫先生革命隊伍的主力。檀香山華僑多來自香山，與孫中山有同鄉關係。檀香山的香山華僑是最早擁護和加入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會員之主要成員。1894年，加入檀香山興中會的126人中香山人占70人。^[11]參加興中會的香山華僑，有與孫中山有戚誼關係之程蔚南，孫中山之舅楊文納，同學鐘工字，好友李昌、宋居仁、何寬等。香山華僑除了投身武裝革命，更組織革命團體、他們也辦報、進行革命宣傳和製造輿論、踴躍捐資助餉為革命籌集經費，還認購各種債券。

華僑中對孫中山革命募集了可觀的活動費用；犧牲金錢最早最多的是他的家族。孫中山長兄孫眉可說傾家破產。孫眉於1871年赴檀香山，後在茂宜島墾荒，經營農牧及商業，數年後孫眉成為茂宜島首富，被稱為「茂宜島王」。^[12]1877年，夏威夷政府准許孫眉召華人來島大興墾務。^[13]孫必盛是孫眉後人。他回憶孫眉對孫中山的支持，認為：「曾祖父1871年離開家鄉，去檀香山種田，賺了不少錢，有了自己的田場、牧場。他的事業發展得很快，最富有時，被稱做「貿易王」。曾祖父比孫中山大12歲，他回到香山將孫中山帶到檀香山，送到最好的學校去讀書。後來孫中山回國革命，希望能推翻滿清。1894年他又回到檀香山，組織興中會，得到了曾祖父的支援，興中會大部分人都是曾祖父介紹的。曾祖父經營房地產。我發現他有100多次土地買賣記錄，這些錢後來都用於了中山先生的革命。1906年，曾祖父因傾力支持孫中山革命，終致經營的農場宣告破產。」^[14]孫中山之侄孫昌（1881—1917）也早年加入同盟會。孫中山之兒子孫科（1891—1973）於1910年在檀香山加入同盟會。

在檀香山經商的香山興中會和同盟會員很多，如任《自由新報》經理香山小隱人阮炎（1880-1965），在檀香山興中會第一次會議中被選為副主席和以後任主席及在1904年後擔任《檀山新報》編輯的何寬（1861-1931）。此外李秋（1876—？）、楊益（1885—？）、楊廣達（1869-1933）、卓海（1863—？）、林合（1853—？）、林志（1868-1941）、林康敘（1883-1960）、鄭永（1868—？）、黃慶洲（1860—1928）、程就（1887—1953）、譚池（1865—？）、譚餘（1866—？）、李祿、鐘木賢都是有名的同盟會員。香山崖口隔田人陸進（？—1929）和林近（1877-1957）曾參加檀香山同盟會茂宜分會，他們熱心革命。

香山華僑群體為積極支援和參與革命，提供了相當的經費，有的曾多次購買軍需債券，捐款支持革命。旅美香山北台華僑楊仙逸，父親楊著昆，早年在檀香山經營糧食生產、銷售房地產而致富。楊著昆是孫眉摯友，對孫中山革命十分贊同，是早期同盟會員。他多次捐獻鉅款支持中山先生。旅美香山華僑陳耀垣為支持革命，把自己的「德和商店」和其他資產變賣作為革命經費。^[15]香山人黃詠商1895年參加興中會，並為廣州起義變賣祖產得款8000元，支持革命。香山石岐檀香山華僑黃弼廷（1879-1946）積極支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同盟會分會。香山南朗田邊程璧光（1861—1918），1895年加入興中會，支持孫中山革命。美洲華僑及致公堂和世界各地的華僑籌金助餉，獻身捐軀，為革命建立豐功偉績。1910年參加檀香山同盟會成立會議，並任會計，全力進行募捐。根據陳占勤、蘇幹遠的研究：「檀香山華僑在1894年至1912年間，為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先後捐助美元8000元，銀洋63255元。其中，多為香山籍人所捐助的。」^[16]

澳門香山華商何廷光，曾參與維新，資助並主持《知新報》，後資助革命。^[17]除此了之外，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有旅美華僑程天門、余森郎、吳鐵城、朱卓文，旅日香山華僑劉師復、蕭友梅等在日本加入同盟會，為革命募集大量款項。香山瀝溪人蘇曼殊（1884-1918）早年也留學日本，曾加入進步團體「青年會」，支持孫中山革命。1903年後到香港任《中國日報》翻譯，以寫作宣傳革命。秘密參與黃興籌建的華興會，並以僧人身份在杭州、長沙、溫州策劃起義。在杭州參加光復會，後遭清廷緝捕逃到上海，繼續支持革命。旅澳華僑梁關，旅德華僑楊子毅，孫智興積極動員華僑捐款，支援中山先生革命。孫委任孫智興為香港及海外籌餉委員。

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使很多澳洲香山華僑，「建立各種社團，創辦報紙，捐資捐物，用多種形式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18]旅澳香山沙湧華僑馬應彪是先施公司創辦人，為喚醒民眾，他在省港渡輪借唱聖詩傳教來宣揚革命思想。革命後，馬應彪曾任大元帥府庶務長。郭標一直是澳革命的支持者。

香山華僑程蔚南於1881年創辦的第一家中文報紙《隆記報》，改為黨報。1903年，孫中山從日本抵檀香山，為

和康、梁之「保皇黨」決戰，恢復和鞏固興中會組織，決定開辦黨報。旅美香山南朗華僑李君勤積極捐款資助革命。其子李祿超也加入興中會。1906年，革命黨準備在欽廉起義，他回粵宣傳革命。他謀炸死水師提督李准被捕。1906年前後，北台沙田村林近任創辦《自由新報》等中國報館。香山華僑運用輿論工具，宣傳革命思想，喚起民眾。香山洋沙人許直臣（1867-1949）是檀香山華僑，在檀香山興中會第一次會議中被選為副書記，1908年任《自由新報》主筆，孫中山極其器重他。1910年，孫中山之子孫科，在《自由日報》《大聲週報》擔任編譯，進行革命宣傳，並發表《揚州十日》、《文字獄》、《禁書》等文章宣傳反滿的革命思想。^[19]香山南朗人程天固（1889-1974），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1909年創辦《民呼》雜誌、《誠報》週刊，向華僑宣傳民主革命思想。

三、香山婦女和海員在運輸軍火中的貢獻

在香山地區有很多新女姓的女革命黨員和海員對運輸軍火非常有貢獻。女黨員不易被敵人注視，而海員因工作之便有利於聯絡和運輸軍火工作，這是同盟會吸收女性和海員加入的原因之一。很多澳門的香山女黨員，擔任自澳門把軍械運往香山的任務。香山茶東人陳淑英（1893—1990）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製造、運輸槍彈，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香山金鼎人卓國華（1890—1980）1909年加入同盟會，參與「三·二九」起義的聯絡和掩護工作。1911年4月27日清晨，她假扮新娘運送軍火進入廣州城，被譽為「革命新娘」。香山唐家灣人梁國體（1892—1983）在鄒魯妻許劍魂死後嫁給鄒魯，改名梁定慧。^[20]1910年加入同盟會，奉派至廣州同盟會秘密機關工作。梁定慧因不滿父母包婚而離家投奔在香港實踐女子學校掛名校長的姐姐梁綺川時加入同盟會。她更感動其前夫也加入同盟會，但不久他在革命中犧牲。1911年梁定慧也參加「三·二九」之役籌備工作及惠州、潮州之役。在廣東光復後參加廣東軍政府的北伐軍女子敢死隊。革命需要彈藥，同盟會在海內外設立彈藥製造機關，廣東北伐軍女子炸彈敢死隊隊長宋銘黃，她和廣東同盟會分會會長、暗殺團同盟會團長高劍父（番禺嶺南畫派創始人）一起研製炸彈，並共同參加黃花崗起義。1913年，敢死隊解散，宋銘黃、高劍父結為夫婦。

祖籍香山北嶺、生於上海買辦兼茶商家庭的徐慕蘭、徐宗漢姐妹原是大家閨秀，從小卻受西方文化薰陶。北嶺村的徐氏家族，在十九世紀中葉就移居上海，其中先輩徐榮村獲得世界博覽會絲綢一等獎，叔叔徐潤在滬上主持招商局局務。^[21]姐姐徐慕蘭秘密加入同盟會，以富家少奶奶身份掩護運輸軍火、聯絡革命隊伍，是廣州女革命黨核心人物，也是廣東女子北伐隊隊長，並率眾與北伐軍共赴戰場。在徐慕蘭帶動下，徐、李兩家先後有11人投身革命隊伍。

有「香山女俠」之稱的徐宗漢（1876—1944）原名佩萱，在清光緒二年（1876年）誕生在上海，自幼受中西兩種文化教育。1892年，佩萱16歲陪著二姐在澳門看病巧遇孫中山。佩萱回家後馬上改名「宗漢」，以表抗爭清廷的決心，接著剪下長辮，要做一男子漢。18歲嫁給兩廣總督署洋務委員李慶春之子李晉一為妻，數年後李病故，遺有一子一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31歲的徐宗漢應執教於南洋檳榔嶼的二姊徐佩瑤之邀，到南洋和姐姐居住，並在中華女子學校裏聽革命演說及自學馬來語。不到半年徐宗漢便可用馬來語交流。

不久孫中山和黃興來檳榔嶼向華僑籌款及宣傳革命。孫中山、黃興均聽不懂馬來語，黃興是湖南人，他聽不懂當地華僑的粵語，徐宗漢便成為黃興和孫中山的翻譯。徐宗漢更學會了黃興的湖南話。孫中山對徐宗漢說：「你有如此出色的能力，應該滿天飛，去籌錢，去革命！」

1908年秋徐宗漢從檳榔嶼取道香港返回廣州，與高劍父、潘達微等開辦審美畫會、受貞閣裱畫店掩護革命活動。她與高劍父、潘達微等組織同盟會廣州分會。1909年秋冬間，為籌備廣州新軍起義，受黃興派遣，徐宗漢與陳淑子（胡漢民夫人）、李自屏（馮自由夫人）從香港取水路運軍火往廣州。徐為了安撫膽小的陳淑子和李自屏及避免清兵之懷疑，路上滔滔不絕談論服裝、化妝、姨太太爭風吃醋的小女人話題。在運送這批槍械彈藥中，徐宗漢靈機地將手榴彈藏在馬桶內。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時，徐宗漢與徐慕蘭的兒子及莊漢翹、卓國興、黃悲漢、李晚援等女革命黨員在香港製造炸彈。她還扮新娘，以明辦嫁妝，暗運軍火。廣州新軍起義前，徐宗漢又與陳淑子和李自屏、孫眉等人在香港縫製青天白日旗，從水路運炸彈往廣州。其間運送槍械、組織入會、協助廣州起義並參加炸彈敢死隊和清作戰。

在黃花崗起義前夕，徐宗漢率領侄兒李沛基、李應生等在香港擺華街機關負責全部炸藥及軍械的運送工作。有跨國視野的徐宗漢還找來一些技術書籍研習炸藥的制做，成了自學的女炸彈專家。為了將彈藥順利運進廣州，徐宗漢又再次導演另一幕「革命新娘」的故事。她自己扮作一外嫁新娘。革命黨員也扮作迎親隊伍，在鑼鼓和鞭炮聲中暗運武器至廣州各地。黃花崗革命中絕大部分炸藥都由徐宗漢領導的黨機關組裝及運送。

1911年徐宗漢參加黃花崗之役。失敗後35歲的徐宗漢與廣東番禺女醫師張竹君（1876-1964）一同護送負傷的37歲之黃興潛逃至香港雅麗醫院療傷及做手術。在張竹君支撐下，徐宗漢以黃興夫人名義簽字。若非徐宗漢和張竹君鼎力相助，黃興的性命恐怕難保。^[22]在黃興療傷期間，徐宗漢對黃興關懷備至，等黃興傷癒出院後，黃興和這位4年前曾在檳榔嶼有過一面之緣的徐家大小姐結為成患難夫婦。^[23]當時黃興曾組織「東方暗殺團」，徐宗漢參與了暗殺

鎮壓黃花崗革命的廣東水師提督李准之計畫，只是暗殺未及實施。武昌起義爆發後，徐宗漢又陪同黃興離港赴上海，再次由張竹君以紅十字會的的之掩護，送黃興到武漢就任革命軍總司令。黃興上前線，徐宗漢則參加醫療救護工作。徐宗漢恐和議不成，就組織「北伐炸彈隊」。^{【24】}

上述香山女革命黨員的英勇事蹟可看出女性在辛亥革命的作用和貢獻。大多數香山女革命黨員都有長程旅遊經歷，這對她們完成革命任務有利。

四、香山革命

香山起義是辛亥革命期間一次非常重要之革命行動。一九〇三年，劉師複(1884-1915，原名紹彬，字子麟，學名紹元)^{【25】}和濠頭鄭彼岸(1879-1975)等人在香山縣創辦香山閱報社。鄭彼岸、林君複、劉師複、鄭仲超等七個香山人留學日本時結識了孫中山並加入同盟會，隨即受委派到澳門等地建立分會。澳門荷蘭園和隆街21號的「樂群書室」是當時同盟會的據點。1909年冬，謝英伯等人在澳門南灣街41號成立同盟會分會，進行廣泛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積極推展革命工作。後來「鄭彼岸、林君複等受孫中山之命策劃香山革命」。

1908年9月16日鄭彼岸與李憐庵和香山牛起灣人楊子毅(1878-1953)創辦《香山旬報》，鼓吹監督地方行政，改變社會風俗，以文章進行革命宣傳。《香山旬報》設在石岐西門外天字43號的李崇正堂，在香山各地，廣州、澳門、香港、上海及在北美和南洋等香山華僑聚居等地設代理處。黃冷觀是清末舉人當年曾因參加創辦《香山旬報》和《香山旬刊》，因鼓吹民族思想遭到監禁，幸得康有為出面保釋。

澳門是香山革命的策源地。香山安堂林君複(1879-1942)，早年為孫中山籌募革命經費，在澳門創立「醒同仁」後改稱「仁聲」劇社，宣傳革命，並組織運送武器，準備起義。1909鄭彼岸參加香港同盟會劉師複和鄭佩剛等人組織「支那暗殺團」，籌畫暗殺攝政王載灃，後炸傷提督李准和炸死欽差大臣。並與林君複在澳門組織同盟會南方總支部，積極宣傳革命。香山林仲池由林君複介紹加入澳門同盟會，受委任為中國同盟會卓山支部主盟人，設暗殺機關于卓山學校。香山革命時，林仲池與林君複、莫紀彭等黨員召集同盟會員光復香邑。香山翠亨村人楊殷(1892-1929)，1911年在廣州加入同盟會，後到澳門南方總支部工作，經常在澳門、香港、廣州、香山等地聯絡革命黨員和會黨。香南山屏人陳景華，1910年在香港當買辦，暗中從事革命活動，為同盟會南方支部代收郵件，並設法營救因謀炸李准被囚的劉思復出獄。香山楊梅斜村陳永安是有名檀香山商人陳芳之孫，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陳永安辛亥革命前夕返回香山，同盟會員利用他在家鄉居屋作為聯絡點和軍械存放處，策劃革命。1911年11月在澳門參與組織前山新軍革命，光復香山。革命後，任香山知事兼警察局長。

同盟會香港總機關決定在香山發動廣東的首場革命。香山革命主要成員有肖楚璧、鄭仲超、劉卓棠。他們也喬裝新娘、陪新娘運送軍火的林壽華、黃文軒，小欖開明士紳何培樵、綠林李就成、任順添等，都對這次香山革命起了重要作用。林君複與莫紀彭、何振、鄭仲超等策反駐守前山的2000餘新軍，在營長任鶴年的指揮下於5日在前山起義。林君複任香軍總司令，策動前山新軍起義。成功後，率領李傑夫、林警魂等各路起義軍攻破石岐縣衙。旋克順德及進入廣州，被廣州七十二行推為都督，婉辭。

鄭彼岸等策反駐在香山縣城的清兵。1911年11月2日，香山革命在小欖爆發。11月5日光復香山縣城。隨後，前山新軍改編為「香軍」，推舉任鶴年為司令、何振為副司令、莫紀彭為參謀長。進駐廣州。不久，香軍又編入廣東北伐軍和上節所談及的香山女同盟會員，如梁國體等廣東女子北伐隊經南京進入徐州。香山是廣東第三個光復的縣，比化州、新安遲了一些，但其在廣東革命史中十分重要。

五、結語

本文從香山革命黨人，特別是他們的國際視野和經歷來分析這一具有「敢為天下先」的革命傳統是如何和其他區域革命黨人不同。檀香山和其他各地的香山興中會和同盟會員及香山女革命黨人均有不同的地區特質，籍得有深刻研究。東莞黨員莫紀彭在他的口述歷史指出，香山革命「不特廣東首義之師，且為東南各省義旗之冠。」可見香山革命在辛亥革命之重要性。另一香山唐家灣人唐紹儀(1862-1938，名紹怡，字少川)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武昌起義後任南北議和北方代表。中國的共和談判也在這個香山人手中完成。本文只是初探，希望以後能作深入一點之研究。

註釋：

- [1] 例如 Michael Gasster,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463-534; Zhang Kaiyuan, "The Revolutionary Slogan 'Expel the Manchus' and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Eto Shin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rin, e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p. 33-48; Hu Sheng, 'The question of anti-imperialism, democra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1911 Revolutio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15, No 3-4, Spring-Summer, 1982, pp. 61-75; 金冲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運動史稿》，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朱英主編：《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有關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每十年和其他時間都有舉辦國際會議和出版論文集，其他專書和論文也很多，不在這裡詳細說明，可參看 Winston Hsieh,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 Philip C. Huang, ed. "A Symposium on the 1911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2 (April 1976); Edmund S.K. Fung, "Post-1949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1911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4.2 (April 1978), pp. 181-214; Chang Yü-fa,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 Retrospective after Seventy Years",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5.3-4 (Spring-Summer 1982), pp. 20-45。
- [2] 參看 Mary Clabaugh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Edmund S.K. Fung,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 Ching-Hwang Y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 (1976); Roger R. Thompson, *China's Local Councils in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1898-191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ve Armentrout Ma, *Revolutionaries, Monarchists, and Chinatowns: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Women i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Ono Kazuko,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4-92.
- [3]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hai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Fei-ling Davis, *Primitive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1).
- [4] Marius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Chun-tu Hsueh, *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Don C. Price, "Sung Chiao-jen, Confucianism and Revolution", *Ch'ing-shih wen-t'i* 3.7 (November 1977), pp. 40-66; Young-tsu Wong,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5] 參看 Mary Backu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中文專書十分多，不在這裏詳細說明。
- [6] 最近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黃鴻釗編著的《辛亥革命時期之香山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通過地方史料，闡明香山革命是「全面的、典型的。」我目前還未有看見此書。以後才作評述。
- [7] 參看黃健敏：「《香山循報》所見廣州三·二九起義前後的香山縣」，《近代中國》2008年第18期，頁20-37。；陳博翼：「口述史中的關係——民國時期香山名人與孫中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61期，2010年10月15日，頁10-21；何偉傑，「從澳門到石岐的光復：香山起義中的革命者、新軍與團練」，《澳門研究》第52期（2009.6），頁21-27；鄭佩剛，「《香山旬報》及其創辦人鄭岸父」，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25輯，頁143-155。陳占勤 蘇幹遠，「華僑是革命之母」——孫中山與香山華僑（2002）；鄭彼岸：《香山起義回憶》，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1963年，頁338-343；胡波，「孫中山與海外香山人」，載於氏著，《思想人物與歷史文化：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論文集》，湖北辭書出版社，2002年3月1版，頁350-366。
- [8] 參看中山僑刊，2010年10月，頁14-15；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的<http://www.sunyat-sen.org/zthg/xhgm90/zhanlan2.htm>。
- [9] 汪敬虞：《唐延樞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 【10】參見黎志剛：《近代廣東香山商人的商業網絡》，載王遠明主編：《香山文化：歷史投影與現實鏡像》，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 【11】參見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載於《近代史資料專刊：華僑與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1-93。又見氏著，《革命逸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 【12】參看《革命逸史》，第2集，頁1-9。
- 【13】《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稱，「乃兄德彰為茂宜島大畜牧家，其牧場廣千數百畝，有茂宜王之稱。總理蒞檀後，先赴茂宜牧場，就商于乃兄。德彰首贊成之，自願劃撥財產一部為助，更移書檀中各親友，為總理先容，興中會之成立，德彰之力為多焉。」
- 【14】參看「以『香山華僑與辛亥百年』為主題的城市論壇昨舉行」，「載於時尚中山生活網http://news.tt0760.com/zq/2010-11-15/tt0760_12876.html, 2010-11-15。
- 【15】參看《革命逸史》。
- 【16】參看陳占勤 蘇幹遠，「華僑是革命之母——孫中山與香山華僑」(2002, 9.14)，原文地址：<http://www.xinhai.org/yanjiu/19110868.htm>。
- 【17】參見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載於《近代史資料專刊：華僑與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1-93。
- 【18】參見陳迪秋，「澳洲香山華僑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的貢獻」引自<http://www.xinhai.org/shi/191103091.htm>
- 【19】陳占勤 蘇幹遠，「華僑是革命之母——孫中山與香山華僑」。
- 【20】馮雙編：《鄒魯年譜》，中山大學出版社，2010年2月1版，頁39-40。
- 【21】參看《革命逸史》，第3集，頁334-337。
- 【22】參看《革命逸史》，第2集，頁40-44。
- 【23】Chun-tu Hsueh, 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92, 110, 169, 181, 206, 219-20, 222.
- 【24】馮自由：《徐宗漢女士事略》；沈錦鋒：《徐宗漢》、《珠海人物傳》上冊。
- 【25】《革命文獻》，第3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53年），頁223-224；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輯，頁281-282。